

湖北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44184/09

湖北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地址：武昌洪山路11号

*

湖北省水利厅印刷厂印

1984年9月出版

书刊编号：鄂内字第0047号

定价：0.75元



《湖北文史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蒋介石为什么叫我到襄阳去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 康 泽 (1)
-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在襄阳全军覆灭..... 周建陶 (8)
- 襄阳战役全歼康泽所部经过..... 章戈鸣 (20)
- 康泽去襄阳前在汉口的活动片断..... 郑桓武 (26)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序幕——

- 策划进攻宣化店的内幕和部署 范汉杰 (31)
- 武汉行辕为进攻中原军区召开的“绥靖会议” ... 郑本安 (36)
- 围攻宣化店中原军区的经过..... 宋瑞珂 (41)
- 围攻宣化店，打出内战第一枪..... 周上凡 (52)

国民党七十九军在荆门被歼经过 方 靖 (58)

- 关于七十九军被歼的回忆..... 徐光宇 (63)
- 荆门战役见闻..... 邹 飞 (65)
- 忆解放荆门的战斗..... 齐 勇 (67)

白崇禧发布“总体战”方案的始末…………… 黄 健（ 71 ）

白崇禧在大别山建立反共根据地阴谋一例…………… 樊 迅（ 81 ）

蒋桂矛盾的几点见闻…………… 朱鼎卿（ 85 ）

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教育界

派系和组织的明争暗斗…………… 王益昶（ 92 ）

湖北教育界的派系斗争概略…………… 李骧五（ 105 ）

简述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 黄师让（ 122 ）

湖北纱布丝麻四局经营始末…………… 刘源清（ 127 ）

张之洞在湖北创建的布纱丝麻呢五局…………… 蒋乃镛（ 142 ）

应城膏盐今昔略述…………… 邹峰儒（ 152 ）

应城膏盐产销简史…………… 陈家仁（ 158 ）

解放战争时期的民生公司和卢作孚…………… 黄绍洲（ 174 ）

✓ 一九四七年美英循道宗在中国的应变会议…………… 胡学汉（ 181 ）

蒋介石为什么叫我到襄阳 去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康 泽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间，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先生强迫我辞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职务，并派我出国考察。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在华盛顿接到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的通知：九月间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七月间开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察联席会议，希望我回国出席。我为了慎重起见，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他的复电是：“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国建设可也。”很明显地表示了他不愿我回国参加三青团干监联席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就没有回国。一九四六年底，我在华盛顿接到汤如炎（前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中央干事，党团合并后，转为国民党中委）和刘书传（当时在教育部做事）的信，他告诉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开会，希望我回国参加。而且在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曾正式通知我，要我回国出席三月间召开的三中全会。因而，没有再打电报请示蒋介石，于三月六日从美国回到了上海。我想这是符合蒋介石要我“明春回国……”的指示的。不料，蒋介石还是不愿我这时回国，对我回国是不高兴的。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即于九日到南京，去蒋介石侍从室报到请见，蒋介石批由吴鼎昌代见，我愤而未去。三月十二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首先是全体中委谒中山陵，我去参加

了。第二天举行开幕仪式前，在会议休息室蒋介石接见我一次，因人多，没有谈什么。在会议的过程中，宋美龄在她的住宅约见我一次，她问我：“见一见委员长吗？”（那时蒋介石就在楼上）我说：“委员长事忙，他今天没有约我，以不去见为好。”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次的中央全会（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中常委三分之一，我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从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十月，我在中常会和立法院与孙科、丁淮汾、朱家骅等人声气相通，与张群、李惟果密切合作，一切活动，都能得心应手。如：

（1）在中常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审核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名额的组织）：张群只是政治方面有些办法，在党内总是受C.C.派的排挤，我在党内支持他，所以他很信任我，曾对我说：“你就可以代表我们三个人（张群、李惟果和我），我不在，你就可以代表我。”李惟果是个漂漂亮亮、滑里滑头的人，对张群和我合得来，与C.C.也合得来，他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的国民党内没有基础，许多事要拉拢我，因此我和他们之间，对党的事情办得很合手。

在选举方面，我在地方上没有负担。C.C.在地方上负担很重，都向他伸手要名额，陈立夫无法应付，常常避不见面，敷衍推诿，引起C.C.内部很多人的不满，从而走向反C.C.的一面。例如：有个李琢仁，C.C.派，成都人，他找陈立夫无结果，通过李天民（曾任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向我疏通，表示如果能帮助他当选，将来他可以听从我。这一类的人，找我很容易，我不轻易答应人，答应了，一定办到。因此，凡找我的人，我都帮助他们当选了，就是不找我帮忙的人，对我也有好印象。陈立夫那时是中常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野心勃勃地想掌握选举指导委员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是隶属中常会的组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妙的计策：在一次中常会上，他以中央政治

委员会秘书长的地位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凡是中央的人事决定，都要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人选，这里作了审定之后，还要送交政治委员会，我想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他是想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把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人选的最后决定权一下转移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政治委员会有人事先向我通了消息，我已有准备，当陈立夫报告做完，我首先起来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组织没有权力审核和它平行组织的東西。接着丁淮汾和朱家骅等也相继起来支持我的意见，驳斥了陈的报告；孙科更是大发脾气地说：“老子做的事，还要儿子来管吗？”（指选举指导委员会的人选，不应该再交政治委员会）于是，陈立夫这个打算就被推翻了。

（2）在立法院：由于我在三青团援引“太子派”的梁寒操任三青团中央常委干事，钟天心任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孙科对我有好感，尊重我的发言地位。我对一批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很尊重，因而他们也都尊重我。

在立法委员中，参加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只有孙科、梁寒操和我三个人。头一届的立法委员，都是圈定的，以后凭选举。圈定的立法委员，在这一次选举问题上，除了指望孙科能在选举指导委员会内为他们讲话外，就是希望我支持他们。因此，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尊重我的意见。

分区审查川籍立法委员时，川籍立法委员也都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有实力，又比较“公正”。

有一个名叫张铁君的贵州人和湖北的田亚丹互争湖北工会的一个立法委员名额，张原是改组派，以谷正纲为背景；田亚丹是复兴社分子，以我为背景，如果我单方面地支持田亚丹，是完全可以击败张铁君的。但他们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作出仲裁，同意了他们“平分秋色”的办法，即把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由他们两人分先、后期来当，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纠纷，得到

他们对我的好评，说我处事“公平”。

正当我的政治活动搞得很活跃、很得手的时候，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派我到热河去视察党团合并的情况。他的腹案是等我视察回来以后，派我到热河去接替刘多荃的省主席职位。（据我了解：陈诚曾打电报保举秦德纯任热河省主席，蒋介石复电认为秦“不宜”，以年轻干练的康泽或贺衷寒为好，并问陈诚：康、贺二人以谁最为相宜，陈复电说：以康为宜。）我去热河视察后，了解到全省六百万人口，二十一个县，现在只剩九个不完整的县，其余都已解放；省政府的经费，完全靠中央；武装力量，只有五个不完整的保安团。我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说：“现在的热河，还不及内地省的一个行政专员区。”他知道我无意于这个职位，就没有派我当。之后，他问我：“派你到北平行营新闻处去怎样？”我答：“北平新闻处的赵可夫是很好的同志，在那里做得很好，不需要更动。”他又问：“派你到东北行营新闻处去怎样呢？”我说：“东北行营新闻处的余纪忠，曾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是留英的学生、一个很好的同志，也不宜更动。”最后他说：“你看，你做什么事情好？研究研究后对我说。”我说：“我的一切，委员长都是知道的，请委员长决定好了。”说罢，我就告辞了。

同年十一月初，邓文仪和罗泽闾一道到我家里来（他们都是参加了作战会议的，罗是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传达蒋介石要派我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决定，并对我说：“委员长在作战会议上曾经吩咐要把这一区划大些。”我当时没有对他们表示态度。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蒋介石公馆去开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到后，看到有蒋经国、胡骥、罗泽闾、徐佛观、张一清、谷正鼎、袁守谦等人在讨论办一个训练班的问题。那时，蒋经国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我了解，蒋经国准备把党团合并以后的国民党各级干部，由他办个训练班

来加以训练，未经过训练的，一律不准活动。这是蒋介石准备要他的儿子把国民党一手抓起来的阴谋之一。因为我不是为参加这个会去的，直等到他们散会后，蒋介石对我说：“派你到襄阳去好不好？”我说：“服从命令”。蒋介石一面说，一面走向另一个会客室去，他继续对我说：“拨六十五师、二〇二师和川军三个旅（即：一六三旅、一六四旅和新十八旅）交你指挥。”又说：

“如果军事上很罗嗦，我可以派空军来直接援助你，或者空投粮食、弹药接济你。”并且说：“汉中、安康一带，都归这一区管。”我想到拨部队的事，以后还要办手续，罗泽闿在场比较好，当即建议把罗泽闿叫过来一起谈。蒋介石同意之后，我就把罗泽闿叫过来。蒋介石又把拨部队的事重说了一遍，这次会见就此结束。我和罗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之后，先到罗的第三厅去，罗告诉我：六十五师在河南商邱作战，调不下来。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到汉口，在武汉行辕主任程潜那里得知：二〇二师的师部在成都，有一个旅在津浦线作战，一个旅在鄂东，也不能调了。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在信阳附近跟二十师一道作战，新十八旅在武汉附近，是程潜的直属部队，都不能调，只有一六四旅驻在樊城，它实际上只有四个破烂的营。至此，我才知道蒋介石所说的拨部队交我指挥，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

一九四八年元旦那天，程潜先生对我说：“南京方面来了两、三次电话，催你到襄阳去，那里没有部队，怎么能去？现在你不能去，我负责。你要是去了，共产党要把你捉起走。我调八十五师的二十三旅到襄阳去，等二十三旅到了那里，你再去。”当时，我曾经这样想：那里没有部队，委员长不能不知道，没有部队，我怎么能去呢？一月十日左右，我接到武汉行辕由程潜主任署名转来南京方面的一个电报，内容是传达南京方面的命令（不是用蒋介石的名义，催我赶快到襄阳去，“否则以违命论”。当时我很惊

异，拿着这份代电到武汉行辕找第三处处长（忘了姓名），把原电交给他看，向他查问原委。他说：“这件公事，是参谋长（刘膺古）划行的。”过了几天，我又拿着这份代电去找行辕秘书长邓介松，他一看这个电报，就把它收去放进衣袋里，并说：“这是糊涂。”因为那时程潜先生正为了帮助我调派部队到襄阳去，而此时我在武汉也正帮助程潜先生作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利用过去三青团的关系，把湖南、湖北两省的票都拉过来，为程先生竞选，所以程先生每次请客，几乎都请我参加。

二月十天左右，我接到蒋介石从庐山发给我的电报，嘱咐我两件事：一是要我在辖区内春节期间禁放鞭炮，二是要我把到襄阳后的工作每周向他报告一次。我到襄阳以后，照他的命令行事，鞭炮禁放了，工作报告每周一次，但一个多月没有指示。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到南京见蒋时，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指示。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奇怪，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一九四八年七月，解放军围攻襄阳时，我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他于十三日（或十四日）给我一个电报，要我把部队都调到城里去。十五日（襄阳解放的前一日）他又给我一个电报，要我以“智勇”来对付“优势之敌”。总之，他是只要我为他卖命，其它的条件是不给的。我当时还不怀疑他，总以为他是无兵可调哩！

一九四七年四至十月间，我在南京很活跃，不是闲着没有事做，而是有很多的事做；但蒋介石一则派我到热河去，给我一个很高的空地位——当“主席”。再则要派我到北平和东北去搞新闻（政训）处工作，最后派我到襄阳去做“司令官”，空许调许多部队给我指挥，而实际不派兵给我；说要扩大我的管区，实际并没有扩大。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推出去，把我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很明显，他是觉得我在南京，对他培植蒋经国有妨碍。

我跟蒋介石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只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地感到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么“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踏地的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董益三记录整理）

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在襄阳全军覆灭

——蒋介石、白崇禧互相推诿战败之责——

周 建 陶

〔内容简介〕由康泽任司令官的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所属的国民党部队（一万一千余人），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湖北襄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周建陶在这一战役中，曾以“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身份，参与督战。战役结束时，周建陶化装逃脱，曾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并在国防部军事会议上汇报假情况，为蒋介石掩饰，替康泽吹嘘，并力图开脱自己，以求幸免。本文系作者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忆述，颇为真实”

一、襄阳战役发生前的第十五绥靖区兵力部署

一九四八年七月，襄阳战役发生前，第十五绥靖区共拥有三个旅（七个团）、一个化学炮连、宪兵一排、以及二十三师黄子华旅的一个军士连（该连留置襄阳构筑司令部据点碉堡），不包括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的地方团队，总兵力在一万一千人以上。

三个旅中，两个旅（四个团）属于四川已故军阀刘湘系统的杂牌队伍，一为陈旅，一为刘旅（各两个团）。康泽认为，陈旅战斗力较强，以之守备老河口，独当一面。刘旅守备樊城，并维护樊老公路交通。

另有一个旅（三个团）为国防部后调旅，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康泽则以之安排于襄阳，亲自督训，作为他的基本势力，并以其第一、第二两个团分任襄阳西南郊高地之守备，该旅第三团成立较迟，正在装备，摆在南郊训练。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奉蒋介石之命，率战地视察组第八组到襄阳第十五绥靖区视察，为配合康泽，指派少将视察官石克武、上校视察官王天伦和肖××（忘其名，在襄阳钟楼据点督战被击毙）等到襄阳城刘旅、老河口陈旅及襄阳国防部后调旅，分途视察。我指使他们注意监督康泽对各该旅所下达的有关作战命令的贯彻执行，深入了解各该部队的军心士气，督促加紧训练，准备和解放军作战。

我抵襄阳之初，曾问康泽：“假如敌人以重兵进攻襄阳，怎样应付？”他说：“目前情况，敌人还不会有很大的兵力来攻打襄阳，假如要来的话，必先犯老河口，而后樊城；襄阳地势险要，又有汉水之阻，易守难攻，万一战事发生，总统所派的援军很快也就到了，襄阳可无忧虑。”这是在襄阳战役发生前一个多月的事。后来，襄阳战役发生，确是先从老河口开始。但老河口解放后，解放军却不是如康泽所预料的先打樊城而后打襄阳，而是以主力指向襄阳，指向康泽所认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阵地。至于解放军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哪些地点渡过汉水的？康泽和我却一直没有摸清。

二、乐极生悲，老河口在康泽祝寿声中解放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也许是前一日或后一日，回忆不清）的晚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的科级以上人员数十人，在康泽的私寓，为康设宴祝寿（我被邀参加）。宴毕，正在举行舞会之际，忽然老河口方向传来消息，说解放军攻打甚急，向康泽请示机宜。大家一听，目瞪口呆，莫知所措。良久，我才问康泽：“为什么事先一点情况也没有，一下子就打起来了？”康泽不答，只

是摇头表示事出突然。副司令郭勋祺则颇为沉着，对康说：“老河口太重要了，敌人这次突如其来，非同小可，应该派人前去协同陈旅作战。”康泽正苦于无计可施，听郭这样说，连声表示“是，是……”，郭勋祺耳朵聋，没有听清，又把他的话，向康泽重说一遍，并把耳朵靠近康泽的咀巴，听康的答复。康泽这才作出决定：“这只有请副司令去走一趟了。”郭勋祺欣然从命，于次日驰赴老河口指挥作战。我也指派在老河口陈旅的视察官王天伦，对陈旅官兵加紧打气。

郭勋祺到老河口后，解放军一面加紧围攻老河口，一面向襄樊方面进军，郭勋祺深恐后路被截断，欲归不得，向康泽频频告急，康泽既怕老河口不守，陈旅被歼；又以未奉蒋介石之命，不敢下达撤退命令。于是，他乃示意郭勋祺“相机行动。”郭勋祺得到这一指示，马上率一个营（二、三百人）很快逃离老河口，回到了襄阳城外。却没有料到，解放军抢渡汉水，行动神速，陈旅其余部队都被解放军截住，被歼于襄阳外围。

陈旅被歼灭，无一兵一卒回到襄阳城。究竟在何时何地就歼？襄阳方面毫无所知，在襄阳战斗开始后的头两、三天，解放军对襄阳包围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康泽还在幻想，陈旅能绕道南漳，从襄阳以南地区回到襄阳县城。

三、襄阳、樊城两城之战

襄阳、樊城战斗展开之始，第十五绥靖区兵力部署概况：

一九四八年七月初，解放军解放老河口，歼灭陈旅同时（七月五、六日），即向襄樊展开攻势。康泽首先仍认为解放军必先以重兵指向樊城，并将部队作出如下部署：

- （一）刘旅（川军两个团）仍守备樊城；
- （二）国防部后调旅第一、第二两个团，守备襄阳西南郊高地，控制襄阳制高点；第三团任襄阳城警戒；
- （三）化学炮连和二十三师黄子华之军士连以及随郭勋祺自老

河口逃回襄阳的陈旅之一个营、宪兵一排，均置于襄阳城。此时防守县城部队，共有八千人以上的兵力(不包括地方团队)，粮弹无缺。我也从樊城赶到襄阳，并指派少将视察官石克武(联勤总部少将部员)负责监督粮弹补给。

我从樊城到了襄阳之后，守备樊城的刘旅长，在战斗开始三天后，也自动退出樊城，渡过汉水，逃到襄阳东城叫唤开城(战斗开始后，康泽即将城门关闭，不准官兵自由出入)。康泽、郭勋祺和我都以为樊城失守，相顾失色。经过探询，才知道樊城并未丢掉，解放军也未进入樊城，只是刘旅长带了部分先头部队(二、三百人)，渡过汉水，躲在城脚下。于是康泽板起面孔说：“这还了得，不能让他进城。”郭勋祺瞧瞧康泽，又瞧瞧我，摇摇头，不作声。这时，我认为郭勋祺想保全实力，暗示刘旅长自动退出来的。所以我面向郭勋祺说：“没有命令，是不容许这种行动的。”郭勋祺这才说：“对，没有命令，不能让他这样做，我去叫他回去。”说了就走，赶到东门城楼劝告刘旅长仍回樊城继续抵抗。但樊城方面始终未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对樊城只是一种佯攻态势，牵制了康泽两个团的兵力。

襄阳西南郊高地，为襄阳屏障，康泽曾竭尽一切手段，强占土地，征发砖石，大肆砍伐树木，以半年多时间，在高地带构筑大、小据点工事近百处，碉堡一百多个和无数的交通壕沟，每一据点和外壕，都敷设鹿寨，以真武庙为中心的据点，做的特别坚实。

制高点的争夺战，始于七月五日，康泽首先就以他的核心部队——国防部后调旅的一、二两个团三千人以上的兵力控制高地所有的据点碉楼，继则以自老河口回到襄阳的陈旅一个营，增拨到两个团的衔接部。七月九日，当西关外真武庙制高点被解放军占领后，康泽又自樊城刘旅抽调一个加强营，增援西关，并电

由蒋介石派来的两架飞机，以陆空联合，进行反扑，企图夺回真武庙制高点，未能得逞。解放军占领了真武庙高地，不仅瞰制了襄阳城，也瞰制了樊城。康泽终于在七月十日放弃了樊城，将刘旅全部调至襄阳西关至南门外之线，企图确保西南郊高地部分据点。

七月十日联勤总部空投一批粮食、弹药和钞票，一部分投到解放军阵地上，国民党军官兵都怨骂飞行员，不是饭桶就是通“敌”。

七月十一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从汉口派来一架飞机，在襄阳郊区上空散发传单，内容的大意是：劝说解放军“弃暗投明”，不然大军到了，就悔之莫及……。国民党军队也抬得这种传单，认为援军快到，兴奋一时。谁也没有料到，当天晚上，解放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夺去几处重要据点，至是自襄阳城至西南郊高地的补给线路，只剩下一条，还处于解放军有效射界之中，补给线随时有被截断可能。康泽为此彷徨失措，拿不定主意。他的左右，有主张令川军刘旅打头阵，自襄阳南面突围打出去的；康泽和我，都认为这样作正是解放军所希望，等于送死。怎么办？康泽决定，还是等待蒋介石的指示。七月十二日，蒋介石的电报到了，指示康泽“集结兵力，据守襄阳城”。并说：“已令援军兼程前进，敌人缺乏炮弹，不足畏”。同天，蒋介石也给我一电，要我与康泽“共度安危”，电报由康泽亲自转交给我，带着苦笑对我说：“我准备遵照总统的指示做。襄阳城高壕深，有险可守，援军又快到了，不要紧。”我说：“不这样作，又有什么办法呢？逃是逃不了的，援军既已兼程前进，也许几天就到了。总统的指示是正确的，就遵照去作吧。”我并向他表示：“竭尽力之所及，打好这一仗，确保襄阳城”。康泽听我这样说，捶胸拍掌说：“好吧，和敌人干到底！”当天，我还复蒋介石一电：“决与襄阳共存亡。”